

■ 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DOI:10.15998/j.cnki.issn2097-6763.2026.04.005

名校毕业之后:寒门子弟出路分化 与就业适应困境叙事研究



王 艳¹, 陈 斌²

(1. 香港中文大学 教育学院, 香港 999077;

2.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研究院, 厦门 361005)

摘 要:在高等教育扩张背景下,大学生就业成为影响教育公平与社会流动的核心议题。尽管倾斜性招生政策有助于寒门子弟进入精英大学,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实现阶层流动。采用叙事研究法,聚焦名校毕业的寒门子弟,基于本科生社会化理论构建其就业适应的分析框架,并引入精英子女作为参照以增强解释效度。研究发现,寒门子弟与精英子女在社会性投入、职业方向感与工作意义感 3 个关键维度上呈现显著差异,并形成迥异的毕业出路分化格局。寒门子弟社会化进程在从校园向职场的转换过程中呈现结构性断裂特征,面临人际适应、情绪适应和自我适应等困境。为应对这些挑战,寒门子弟可以采取目标导向型、观察模仿型、多元内化型和价值协商型 4 种行动策略。这些策略在实践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构成个体灵活调用的“行动工具箱”;另一方面,不同策略的内在逻辑与行动取向存在明显张力。通过对比寒门子弟与精英子女毕业出路的分化与适应图景,研究揭示了从“文凭获得”到“地位兑现”之间的过程黑箱,系统呈现了阶层流动中“劣势放大”与“优势累积”如何在各环节逐步形塑的微观机制。为此,高校应推动社会化支持从“机会赋予”转向“能力建构”;寒门子弟需强化主体意识,通过累积社会性投入与资本转化以增强其就业适应能力。

关键词:名校毕业生;寒门子弟;社会化;就业适应;叙事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76763(2026)04004910

修回日期:20260306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我国研究型大学‘非升即走’改革试点成效与问题研究”(CIA230324)

作者简介:王艳,女,四川巴中人,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

陈斌,男,江西南昌人,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学术职业与研究生教育研究。

引用格式:王艳,陈斌.名校毕业之后:寒门子弟出路分化与就业适应困境叙事研究[J].重庆高教研究,2026,14(4):4958.

Citation format: Wang Yan, Chen Bin. After elite graduation: a narrative study on career divergence and employment adaptation dilemmas of 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s[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6, 14(4): 49-58.

一、问题提出

自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议题。2025 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 1 222 万人,较 2024 年增长了 15.3%^[1],青年群体就业压力与日俱增。相关数据显示,2024 年全国 16~24 岁青年失业率达 15.8%^[2]。在我国大学生群体中,寒门子弟占比近 70%,在当前大学生就业普遍严峻的形势下,该群体的就业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高校毕业生整体就业的落实水平^[3-4]。所谓寒门子弟,是指家庭资本薄弱且为家族第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村或城市学生。得益于“高校专项计划”等一系列倾斜性招生政策,进入重点高校的寒门子弟人数得到有效增加^[5]。作为个体实现从学生向“社会人”过渡的继续社会化阶段,大学对寒门子弟而言可能意味着双重挑战:一方面需要逐步适应名校^①场域,另一方面要为日益严峻的就业市场储备力量^[6]。

随着名校文凭出现“通货膨胀”,其作为阶层流动“硬通货”的象征性价值日渐式微^[7-8]。对于名校毕业的寒门子弟而言,步入劳动力市场仅是继续社会化的新起点,他们即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就业适应挑战^[9]。所谓就业适应,是指个体在就业时积极融入工作环境和社会生活,在与社会环境的交互作用下实现社会化发展目标的过程,包括人际适应、情绪适应与自我适应等^[10]。学界普遍关注寒门子弟的教育获得机制及其对社会阶层再生产的影响,将寒门子弟进入名校后的体验视为结果变量,相对忽视该群体的内部分化过程和就业适应问题^[11-12]。这一研究取向虽然凸显了寒门子弟在起点与结构上的不利地位,但未能充分揭示他们在名校毕业后如何获得职业地位和适应职场的过程黑箱^[13]。

名校寒门子弟的毕业出路分化和就业适应过程,不仅关乎个体发展,也是高等教育过程公平的重要表征。鉴于此,本研究聚焦名校毕业的寒门子弟这一群体,基于本科生社会化理论构建寒门子弟就业适应分析框架,采用叙事研究探讨其毕业出路分化及就业适应困境,同时引入精英子女作为参照,着重关注寒门子弟从“是否实现流动”的结果导向转向“出路分化及其就业适应”的过程导向。

二、核心概念、分析框架与研究设计

(一)核心概念

寒门子弟社会化通常指寒门子弟通过学习社会文化以提升社会性,实现由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14]。根据不同阶段的特征与任务,可将社会化分为早期社会化、继续社会化和再社会化等阶段^[15],本文关注的大学和就业阶段主要处于继续社会化阶段。关于寒门子弟社会化的理论解释主要包括“亏欠进路”和“补偿进路”两种研究取向。前者是指寒门子弟在社会化成就上,与精英子女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如组织参与率较低、面临退学危机等^[16-17];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和文化资本匮乏,寒门子弟在师生和同伴互动过程中易产生“局促感”^[18];寒门子弟毕业后更倾向直接就业而非继续深造,且职业生涯持续存在困难^[19]。后者是指寒门子弟在意识到自身结构性劣势后会自觉建立道德优势^[20],而且社会化成就较高的寒门子弟具有灵活、将挑战视为成长机会、愿意承担风险等特征^[21]。名校毕业的寒门子弟就业适应不仅体现其社会化能力的发展水平,还深刻影响其职业发展。研究表明,寒门子弟对自身就业的适应水平存在认知偏差^[22]:相较于中产家庭出身的子女,寒门子弟在融入新工作环境、应对职场文化等方面通常遭遇更大挑战^[23]。已有研究从组织归属感^[24]、身份认同策略^[25]、制度依赖^[26]等方面探讨了寒门子弟就业适应困境的成因,认为时间与金钱资源的双重匮乏是制约寒门子弟就业适应的深层因素^[27]。寒门子弟在学期间需要承担家务、从事兼职等生存性努力,挤占了其专业学习与自主探索的时间,进而限制了其就业能力的培养^[28]。

① 如无特殊说明,本研究中的名校主要指我国“双一流”建设高校。

(二)分析框架

魏德曼(Weidman)将本科生社会化视为背景特征、教育经历、个人社群和职业社群相互交互的过程,其社会化成果表现为知识、技能、价值倾向、职业志趣等的形成^[29]。魏德曼通过引入时间维度,并结合奥斯汀(Astin)的“投入—环境—产出”(I-O-E)模型^[30],将社会化过程分为预期、正式和非正式、个性化3个发展阶段。本文基于魏德曼的本科生社会化模型构建寒门子弟就业适应分析框架(如图1)。该框架遵循“输入—过程—输出”的发展逻辑,强调社会化进程的动态性、交互性与结构性。其中,“输入”指寒门子弟进入名校前的家庭资本,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资本。“过程”对应高等教育阶段的社会化进程,即寒门子弟通过增加社会性投入、找寻职业方向感和建构工作意义感,积极进行继续社会化。这一进程不仅受个体特质(如自我认知、感知情绪与行为倾向)的影响,也受组织情境(包括组织支持与组织挑战)的调节。个体特质与组织情境作为内外部影响因素,在社会化进程中交互作用,共同影响寒门子弟的意义建构与行动选择。“输出”体现为社会化成果,即寒门子弟就业后所呈现的人际、情绪与自我适应状态。此外,家庭资本、个体特质与组织情境三者作为持续交互作用的内外条件,为寒门子弟的大学社会化进程提供了初始约束与情境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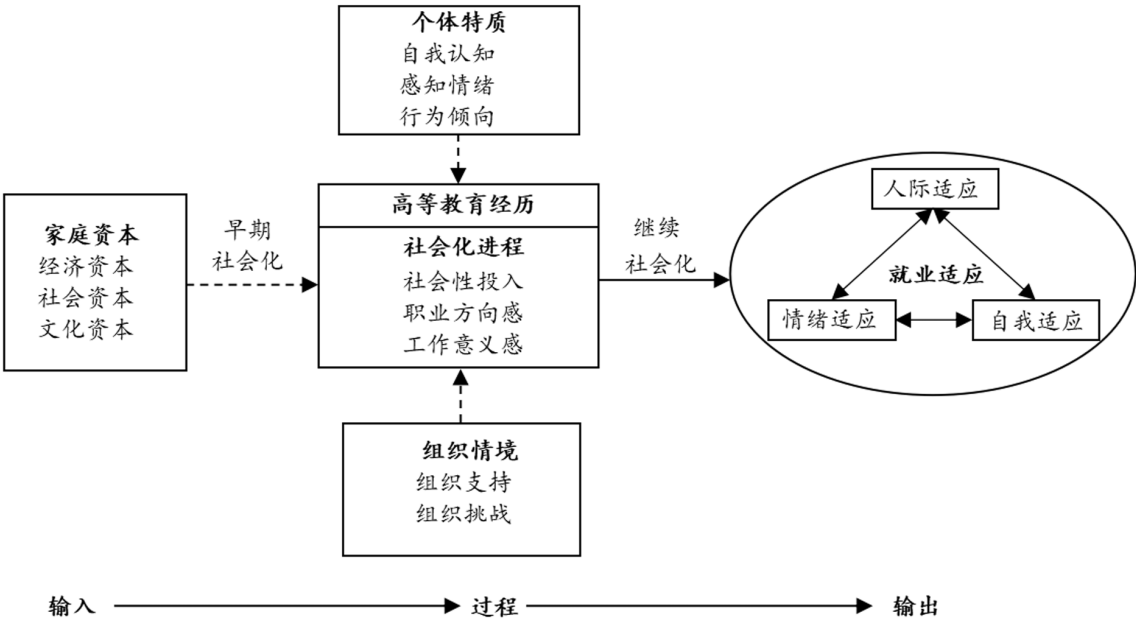


图1 寒门子弟就业适应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叙事研究是理解和刻画个体成长经历的有效方法,通常以个体叙述、访谈或日常观察的方式讲述故事^[31]。基于叙事的分析不仅能够生动呈现故事,也是解释和理解寒门子弟从名校到职场社会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为此,本研究采用叙事研究,通过深入挖掘寒门子弟毕业出路分化及就业历程中的整体性和独特性,揭示宏观社会结构映射微观个体经历的社会化机制。

本研究遵循最大差异抽样和目的抽样原则,选取毕业于名校的21位寒门子弟和8位精英子女作为访谈对象。本研究选取的寒门子弟在校期间均被认定为贫困生,精英子女在校期间均未被认定为贫困生。在所有受访者中,男生11人,女生18人,学科背景涵盖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文学、理学、工学、农学等。我们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访谈内容涉及受访者的家庭背景、本科受教育经历和就业历程等,每位受访者的访谈平均时长约60分钟。随后,我们对访谈进行录音并及时转录,最终形成30.8万字的访谈文本,并运用NVivo 12软件对文本进行编码分析。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本研究隐去

了受访者个人信息并对其进行编号处理,寒门子弟编码为 S01~S21,精英子女编码为 B01~B08。

三、寒门子弟毕业出路分化的生成逻辑

名校寒门子弟社会化是个体在结构性压力与自我能动性的交互作用下逐渐内化名校场域学术规范与人际准则,在职业方向、价值认同与生活方式上形成显著分异,最终呈现多元化毕业出路格局的过程^[32]。

(一)社会性投入:适应社会的关键过渡

社会性投入是指寒门子弟在人际交往、学生社团、社会活动上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访谈发现,由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区隔,寒门子弟对名校中带有精英主义倾向的社交活动常感疏离。部分寒门子弟受限于经济资本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维持生计,从而挤占其参与校内活动的时间。“我家里比较穷,学费又花了很多钱,所以我只能兼职。我做了很多兼职,每个兼职维持的时间也很长,比如我在学校的档案馆做了两年,还送过外卖。”(S04,私企职员)比较而言,精英子女较早在家中习得与名校组织规范较为匹配的文化和社会资本,因而在参与社会性活动过程中更加“如鱼得水”。同时,精英子女大多拥有丰厚的经济资本,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投身于社团活动。“我当时参加了学校的几个学生组织、社团和主持人大赛,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演讲主持这一类的活动。我的生活费每个月都是比较充足的,不需要去兼职。”(B04,公务员)可见,寒门子弟与精英子女在社会性投入上的路径分野深受家庭资本的影响,即寒门子弟由于缺乏契合名校文化规范的资本积累,只能沿用在基础教育阶段习得的文化知识和直觉惯习应对名校生活;精英子女的早期社会化使其惯习更适应名校场域的主流文化,能有效激活在家庭习得的社交技能与文化符号。

(二)找寻方向感:职业路径的选择分化

职业方向感是寒门子弟毕业出路分化的核心标志。就许多寒门子弟而言,大学前期的发展重心在于适应学业与维持生存,职业规划常常被推迟至毕业前夕。他们大多缺乏来自家庭的职业信息与决策指导,更多依赖学校提供的就业指导等支持服务。例如,S17 在大学期间的自我认知较为模糊,缺乏清晰的职业目标和自我掌控的方向感。“我没想过毕业后要干什么,现在的心思都是当前每一步怎么走,比如下学期的学习、考试。我没有就业的紧迫感,也没有职业规划,都没有想过这些。后来,大四开始写论文的时候,才感到就业的压力,开始思考毕业后要去哪里?”(S17,公务员)精英子女更多体现为“资源支持型”职业规划路径,他们能有效整合家庭资源、个人兴趣与市场信息,有序地开展职业生涯规划。例如,B03 在与父母的协商下,明确了自身优势与短板,在大学期间就把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好了。“我当时有明确的就业想法,自己适合做一些技术、业务层面的工作,而综合性、行政管理类的岗位就不太适合我。”(B03,国企职员)寒门子弟与精英子女在职业发展路径上的选择分化不仅源于就业信息的多寡,更深植于早期社会化中所形成的“决策心智模式”。部分寒门子弟在关乎自身职业发展的重大选择上缺乏职业启蒙与决策训练,而精英子女在成长过程中更多被鼓励并学习如何进行长远规划与自主决策,二者由此在职业路径选择上出现分化。

(三)确立意义感:工作价值的自主构建

工作意义感的建构来源深刻反映了寒门子弟价值内化与社会定位的差异,是其出路分化在价值层面的体现。研究发现,寒门子弟与精英子女在工作价值建构的图式上存在群体性差异。寒门子弟的工作意义建构呈现明显的“家庭责任导向”,他们更倾向于自身经济和社会地位,为满足家庭期待而工作。就 S18 而言,接受精英教育承载着家庭厚望,其工作意义感与经济独立、回馈家庭等责任性目标紧密绑定。“我找工作主要看挣多少,要是挣得够多,国企私企,啥企都行。”(S18,私企职员)精英子女的意义建构更侧重于“自我实现导向”与“社会价值导向”。他们的职业选择更多基于个人兴

趣、价值观契合度、生活方式偏好与发展空间等。例如,B02将新闻工作与社会价值相联结。“首先是岗位我比较喜欢才会去做,因为我岁数还比较小,没有那么看重报酬。第二是专业适配度,我认为首先要适合这个岗位,才能发挥价值。”(B02,新闻记者)家庭背景不仅结构性赋予个体差异化的资源禀赋,更在深层价值层面内化为不同的意义建构框架。寒门子弟工作意义感的叙事通常紧密围绕家庭责任展开,呈现鲜明的外部导向性与现实约束性;精英子女在职业选择中能够更从容地在个人志趣、社会价值与生涯发展之间进行主动协商与整合。

四、寒门子弟就业适应的现实困境

寒门子弟社会化进程并非线性过渡,在从校园向职场的关键转换中呈现明显的结构性断裂。这一断裂源于大学场域与职业场域在文化规则、组织逻辑和价值期待上的系统性差异,并突出表现为寒门子弟在人际、情绪、自我等方面的适应性冲突与张力。

(一)人际适应:人情伦理与职场理性的实践冲突

寒门子弟人际适应困境本质上是其早期社会化和大学阶段形成的人际交往惯习,与职场所需的新型关系规则之间发生的断裂。人际交往是寒门子弟社会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他们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人际交往,将来自组织制度环境与重要他人的规范性压力内化为自身心理尺度^[33]。在传统乡村伦理和相对单纯的高校环境中,寒门子弟习得的基于情感互惠与差序格局的“人情”逻辑,遭遇职场中强调工具理性、绩效导向与资源交换的交往规则,进而诱发人际关系紧张。在受访的寒门子弟中,有不少受访者谈及就业后人际关系处理较为困难。“我在工作中心理压力非常大,其中最大的压力还是人际交往上的,主要是跟同事和领导相处有点困难。”(S19,私企职员)人际适应的断裂在职场“酒桌文化”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关系本位文化中,饮食社交是人们建立或维持社会关系资本和进行社会关系再生产的重要方式^[34-35]。然而,受访的“90后”“00后”寒门子弟普遍对此表现出抵触心理。相较于应对传统等级化交际模式的困难,寒门子弟在与同龄人的交往中显得更为自如。可见,人际适应困境并非简单的社交能力缺失,而是关系规则在不同社会场域间进行转换时发生的结构性断裂。

(二)情绪适应:个体策略与结构性压力的张力失衡

情绪适应指寒门子弟就业后所诱发的情绪体验与自我感知。情绪适应困境揭示了寒门子弟情绪社会化资源在应对职场结构性压力时的断裂与失效。当工作压力较小、工作内容符合职业预期、组织制度能够激发积极性时,寒门子弟通常表现出稳定的情绪;当工作压力较大、内容超出预期、组织制度缺乏吸引力时,他们通常处于消极情绪状态,更易做出回避行为,从而导致情绪适应的不良反应。S16就曾在持续的焦虑状态下选择跳槽到中小学当老师。“我们在公司里必须写日报、周报和月报,如果不忙、没有事情做,日报是编不出来的。我每天都很焦虑,没有工作的时候,我焦虑没有啥可编,忙碌的时候,我又焦虑太累了。”(S16,中小学老师)寒门子弟存在的情绪适应断裂源于双重挤压:一是家庭背景使其更易进入高压力、低支持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二是大学教育在系统培养学生应对职业情绪劳动的特定能力方面存在组织支持缺失。寒门子弟的情绪困境是一种情绪调适的资源断裂,即原有社会化成果所提供的“行动工具箱”不足以应对新的压力情境,从而导致焦虑、倦怠乃至逃离的行为倾向^[36]。

(三)自我适应:职业角色与“理想自我”的整合迟滞

自我适应指寒门子弟就业时通过自我意识的规范、信念的指导和约束调节自身行为,使其适应职业发展和要求的过程。名校教育在寒门子弟社会化进程中植入了关于“高学历—好前途”的“理想自我”叙事,赋予其较高的职业期待与自我价值定位。然而,初级职场岗位的现实角色、发展空间与组织文化往往与此叙事存在冲突,导致“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之间出现断裂。这一断裂实际上源于

个体内部“理想自我”叙事与外部职场结构性位置之间的错位。S08 在入职后的两年间从未停下寻找自我的步伐。“我希望能做让自己快乐的事,这是我来工作单位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如果有一份我想去从事的行业,我可以再去学习,但是我还没找到。”(S08,事业单位职员)寒门子弟自我适应的断裂过程呈现阶段性:初期表现为角色冲击与价值落差,自我预期系统遭遇现实解构;中期进入反思探索期,开始对工作意义、职业价值与自我定位进行主动审视与质疑;后期通过持续的“叙事重构”,在日常实践中不断重述、修补乃至重写自我的职业故事,逐步实现一种“渐进的自洽”。

五、寒门子弟就业适应的行动策略

寒门子弟在从校园到职场的过渡中并非被动承受结构性断裂带来的困境,而是展现出显著的主体能动性。贝瑞(Berry)的文化适应理论将个体适应策略划分为整合、同化、分离和边缘化 4 种类型,为理解个体在不同文化接触中的策略选择提供了分析框架^[37]。我们结合文化适应理论和访谈资料,构建了“目标导向—行动调适”的分析视角,并归纳出 4 种行动策略(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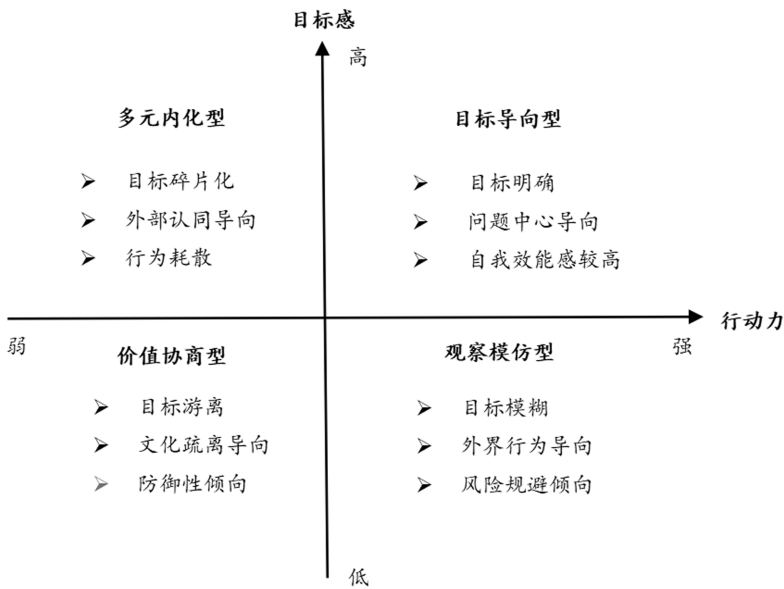


图 2 寒门子弟就业适应行动策略

(一)目标导向型:基于清晰规划的主动适应

在就业适应过程中,采取目标导向策略的个体以精英子女居多,只有少部分寒门子弟采取该策略。这类策略通常建立在较为优渥的家庭资本与系统的继续社会化基础上,表现为个体能够制定并执行具有前瞻性的职业发展路径,其行动方式具有较强的“问题中心”取向。例如,B08 从选择职业路径开始就一直按照职业规划目标进行有针对性地试错。“其实求职过程中最难的是到底往哪个细分方向走,所以一开始我会尝试很多不同的工作类型,也会及时止损。如果我觉得工作内容跟想象的不太一样或者不喜欢,我会立马换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我尝试了很久,最后也找到了一个还可以的实习方向,接连做了两三件比较相关的事情后,才找到了正式工作岗位。”(B08,公务员)采用目标导向策略的精英子女通常能将家庭提供的经济、社会与文化资本转化为职业探索中的试错空间,从而进行更为清晰的职业目标设定与路径规划。他们在就业后不仅能快速适应工作流程和内容,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同样也能依据自身目标采取行动。

(二)观察模仿型:通过行为学习融入主流规范

当面对因“文化工具箱”匮乏而产生的知识技能或行为规范缺失时,许多寒门子弟会策略性地采

用观察与模仿的同化策略,即通过观察组织中大多数成员或权威者的行为方式,快速学习并复制那些被认可的做法,以减少试错成本并获得情境安全感。例如,S21 就谈到“察言观色”在工作中的作用。他是一家公立医院的实习护士,通过观察医院科室中其他人的为人处世,习得在职场上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职场上我会察言观色,在同事间的人际关系处理上,也会小心谨慎。我看到尤其是刚入职的老师做事就很小心,在科室里面会尊称其他人‘老师’,他们的态度很好。”(S21,医院护士)然而,观察模仿型策略也可能存在丧失方向感和判断力的风险,即过于关注群体对自身的评价及接纳程度,容易催生无形压力,导致个体在工作中自觉或不自觉会优先考虑他人意见或群体要求,而放弃自我主张和选择。

(三)多元内化型:多重职业期待下的目标游移

部分寒门子弟在就业适应初期容易陷入“多元内化”的状态,表明其在从外部导向型社会化向自我导向型社会化过渡中的策略选择。其核心在于同时内化了来自多方面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职业期待。例如,S16 在择业时缺乏明确的职业规划,受周围同学和环境影响,将他人和环境的就业目标作为自身目标。虽然多目标增加了她“上岸”的可能性,但精力过于分散也导致她目标失焦。“我毕业时处于非常慌乱的状态。我有点想去公司拿高工资,但怕不安稳。我又有有点想考公务员和事业编,因为二者不一样,当时是都在准备。”(S16,中小学教师)由于被内化的期待并未被有效整合,反而在个体内部形成一种竞争的、碎片化的目标系统,导致部分寒门子弟在职业选择与发展路径上呈现显著的“目标悬浮”与“行动耗散”。寒门子弟长期处于资源匮乏与高期待压力之下,习惯通过满足外部标准获取安全感与认可。然而,当期期待发生冲突时,由于他们缺乏稳定的内在价值标准加以取舍,因而导致其方向感的迷失。

(四)价值协商型:在抵制中划定自我边界

文化疏离感是指因组织文化不能满足员工的需求或与员工期望不符,导致员工与组织文化相分隔的一种稳定的心理认知状态^[38]。当职场中的某些实践或价值观与寒门子弟的内在信念发生剧烈冲突时,会产生文化疏离感,由此部分个体会采取价值协商型的文化疏离策略。这并非消极退缩或边缘化,而是个体的一种具有自我防御性的边界划定行为,旨在保护个体的身心健康与核心价值认同。S03 在担任中小学教师时压力较大,为缓解压力,她选择了与组织文化相疏离的行动策略,降低自我要求和工作投入。“我一开始特别想把事情干好,后来我才发现工作中太积极反而对自己有一定弊端。其实我也偷懒过,事情没怎么干也糊弄过去了,后来自己就没那么积极了。”(S03,中小学教师)不同于“退出”行为,寒门子弟的文化疏离具有防御性特征。这种疏离是个体在面对与自身价值观相悖的强势群体性规范时所采取的一种有原则的疏离,旨在实现融入组织与保全自我之间的平衡,而非全面的文化脱离。此外,文化疏离感作为组织情境中的负面影响因素,对各种与工作、组织相关的行为方式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六、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名校毕业的寒门子弟开展叙事研究,揭示其从大学到职场的复杂社会化进程。研究发现,寒门子弟毕业出路呈现多元分化格局,其深层生成逻辑在于早期社会化所形成的家庭资本与个体特质,与大学阶段的组织情境及社会化进程之间存在动态、交互关系。具体而言,家庭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的匮乏既限制了寒门子弟大学期间社会性投入的广度与深度,也持续影响其职业方向感的形成与工作意义感的建构。这意味着大学和就业阶段的继续社会化进程并非独立的过程黑箱,而是早期社会化成果与高校组织情境持续互动的整合过程,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大学生毕业后的职

业路径分野和就业适应状态。寒门子弟在步入职场后容易出现名校场域惯习与职场规则之间的结构性断裂,并突出表现在人际适应、情绪适应与自我适应 3 个方面的困境。其中,人际交往中的规则错位易诱发情绪焦虑与自我怀疑;情绪调适困境阻碍了职场人际交往与积极自我认同的建立;自我认同模糊进一步加剧了人际交往中的不安与情绪波动。三者构成一个动态循环,共同形塑寒门子弟的就业适应状态。研究发现,家庭资本、个体特质与组织情境等前置因素对寒门子弟就业适应的影响并非孤立作用,而是通过“社会性投入—职业方向感—工作意义感”这一社会化进程进行交互整合,最终综合作用于寒门子弟的社会化成果。

寒门子弟在面对结构性断裂时并非被动承受,而是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发展出一套包括目标导向、观察模仿、多元内化和价值协商在内的行动策略,体现了寒门子弟在就业后对工作场域结构性压力的能动反应。然而,与精英子女相比,其实践策略存在一定的结构偏向。精英子女由于具有优渥的家庭资本,主要采用目标导向型策略,展现出目标清晰的能动性;寒门子弟更依赖观察模仿型、多元内化型、价值协商型等更具调适性、防御性的策略。这一差异表明,早期社会化所形成的资本禀赋与惯习差异在高等教育至职业过渡中并未完全消弭,反而通过名校与职场的持续性互动,被进一步制度性确认、外显并固化为具有不同行动逻辑的实践策略。同时,这些策略在实践中呈现双重特性:一方面,它们不是非此即彼的静态分类,而是在具体情境中被灵活调用与组合的“行动工具箱”,深刻揭示了在结构性约束下个体进行文化适应与身份协商的过程;另一方面,从内在逻辑与行动取向上看,不同策略之间存在张力甚至互斥。例如,基于清晰自我规划的“目标导向型”与囿于外部期待的“多元内化型”在个体自主性上相悖,而旨在融入主流的“观察模仿型”与捍卫自身价值认同的“价值协商型”在对待组织规范的态度上也相互矛盾。

(二)研究创新与不足

在理论层面,我们通过深度访谈并借用本科生社会化理论发现,寒门子弟与精英子女在社会性投入、职业方向感、工作意义感 3 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并由此形塑了毕业出路分化图景。在系统分析寒门子弟毕业出路分化的生成逻辑与就业适应困境的基础上,结合文化适应理论和访谈编码,研究构建了“目标导向—行动调适”的分析框架,据此提出 4 种行动策略。本文通过对比寒门子弟与精英子女毕业出路的分化与适应图景,揭示了从“文凭获得”到“地位兑现”之间的过程黑箱,系统呈现了阶层流动中“劣势放大”与“优势累积”如何在各环节逐步形塑的微观机制。在实践层面,本研究认为促进寒门子弟就业适应与长远发展需超越单纯的经济资助与技能培训,转向对其社会化进程进行系统性、全链条支持。高校应推动社会化支持从“机会赋予”转向“能力建构”;寒门子弟需强化主体意识,通过累积社会性投入与资本转化,增强就业适应能力。

本研究仍存在值得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一是访谈样本有限。受个人隐私限制,自愿接受访谈的名校毕业生以任职于企事业单位的人员为主,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从事其他岗位或社会经济地位发生显著变化的寒门子弟,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二是过程追溯有限。本研究主要聚焦大学至职场的继续社会化阶段,对家庭教养方式、基础教育经历等早期社会化经历如何影响寒门子弟职业路径选择与就业适应的关注不足。尽管在分析中将其作为背景性因素纳入框架,但早期社会化经历与继续社会化阶段之间的具体联结机制与动态影响过程,仍有待通过追踪研究或生命历程视角进一步深入剖析。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2025 届高校毕业生预计规模 1222 万人[EB/OL]. (2024-11-14) [2025-05-04]. <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815659704270115800&wfr=spider&for=pc>.
[2] 2024 年城镇调查失业率[EB/OL]. [20250514]. <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 cn=A01>.
[3] 杨中超,岳昌君,高欣玉. 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毕业意向和去向研究[J]. 复旦教育论坛,2024,22(6):5665.

- [4] 陈涛,巩阅瑄,洪岩璧.走进劳动力市场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基于中国家庭文化价值观的机制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24,22(6):6674.
- [5] 崔盛,吴秋翔.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的实施成效与政策建议[J].教育发展研究,2018,38(3):18-25,50.
- [6] 梁东荣,袁飞,于忠军,等.社会化视角下适应能力的实证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15(9):137-142.
- [7] Collins R. The credential society: an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1979:191.
- [8] 王丹,陈佳欣,史和佳,等.阶层流动还是阶层复制?再读文化资本理论并兼谈“底层文化资本”[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6):5462.
- [9] 杨克,王玉香.走不下“高台”:大学生就业社会适应困境的社会空间理论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24(1):14-20.
- [10] 徐芬,王杨丽,马凤玲.大学生信任倾向对社会适应的影响[J].应用心理学,2012,18(2):120-128,138.
- [11] 李佳丽,郑磊,聂倩.冲破樊篱:弥补性资源、底层文化资本与寒门子弟教育获得——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3(3):100-107,118.
- [12] 吴春燕,刘金典.“90后”农家学子的教育获得与阶层突围——基于家庭资源转化的视角[J].高教论坛,2024(4):120-124.
- [13] 郑雅君.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23:3.
- [14] 白楠楠.基于人的社会化理论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8(1):136-138.
- [15] 谢维和.教育活动的社会学分析:一种教育社会学的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260.
- [16] 朱新卓,石俊华,董智慧.家庭背景对大学生担任学生会干部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13(4):67-74.
- [17] 李济沅.从金榜题名到濒临退学:底层文化资本的结构性困境[J].重庆高教研究,2025,13(6):117-127.
- [18] 安妮特·拉鲁.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M].宋爽,张旭,译.2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7.
- [19] 杨中超,岳昌君.非认知能力对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就业结果影响更大吗?[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5):74-84.
- [20] 杨中超,祝军.摸着石头过河还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赤字和优势视角下的家庭第一代大学生成长之路[J].中国青年研究,2024(8):84-93,83.
- [21] Demetriou C, Meece J, Eaker-Rich D, et al. The activities, roles, and relationships of successful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2017,58(1):19-36.
- [22] 余秀兰.从被动融入到主动整合:农村籍大学生的城市适应[J].高等教育研究,2010,31(8):94-99.
- [23] Arroyo C G, Lundberg C A, Han 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college adjustmen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irst-generation student status[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2019,60(6):687-703.
- [24] Huerta A H, Watt S K. The role of first-generation college students' sense of belonging in academic and social integration[J]. 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 2019,60(5):572-587.
- [25] 吕卫华.农村贫困大学生的社会认同与社会建构[J].青年研究,2007(1):47.
- [26] Mtshweni B V. Adjustment and socioeconomic status: how do these factors influence the intention to drop out of university?[J].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22,52(2):262-274.
- [27] Rubin M, Wright C L. Time and money explain social class differences in students' social integration at university[J].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2017,42(2):315-330.
- [28] Soria K M, Stebleton M J. Social capital, academic engagement, and sense of belonging among working-class college students[J]. College Student Affairs Journal, 2013,31(2):139-153.
- [29] Weidman J. Undergraduate socialization: a conceptual approach[J]. Higher Educati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1989,5(2):289-322.
- [30] Astin A W. Assessment for excellence: the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of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M]. New York: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nd Macmillan, 1993:17-19.
- [31] 王丽,王彦.教育中的“故事”与“经验”:康奈利和克兰迪宁教育叙事探究方法论发展四十年[J].全球教育展望,2025,54(3):64-76.
- [32] 蒋凯,赵菁菁,王涛利.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本科生成长的理论阐释——魏德曼本科生社会化模型评析[J].现代大学教育,2023,39(6):223-232,112-113.
- [33] 鲍威.未完成的转型:高等教育影响力与学生发展[M].北京:科学教育出版社,2014:30.

[34] 边燕杰,刘翠霞,林聚任. 中国城市中的关系资本与饮食社交: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J]. 开放时代, 2004(2): 93-107.

[35] 王春. 官场酒文化之殇[J]. 政府法制,2010(12):3435.

[36] 田贤鹏,曲俊利. 向阳而生:精英高校寒门学子积极情感能力的生成机制研究——扎根理论的质性分析[J]. 高校教育管理,2024,18(4):7888.

[37] Berry J W. Immigration, acculturation, and adaptation[J]. Applied Psychology,1997,46(1):534.

[38] Banai M, Reisel W D, Probst T M. A managerial and personal control model: predictions of work alien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in Hungar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2004,10(3):375392.

(责任编辑:张海生 校对:刘大川)

After Elite Graduation: A Narrative Study on Career Divergence
and Employment Adaptation Dilemmas of 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s

Wang Yan¹, Chen Bin²

(1. Faculty of Edu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999077, China;
2. Center for Research on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graduate employment has become a core issue affecting educational equity and social mobility. Although preferential admission policies help 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s enter elite universities, this does not necessarily guarantee class mobility. Employing narr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 study focuses on 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s who graduated from elite universities, an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ir employment adaptation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undergraduate socialization theory. The study also includes their privileged peers as a reference group to enhance interpretive validity. The study show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and privileged backgrounds in three key dimensions: social investment, career orientation, and sense of meaning in work, resulting in distinct patterns of post-graduation outcomes. The socialization process of disadvantaged students exhibits structural fragmentation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campus to the workplace, presenting challenges in interpersonal adaptation, emotional adaptation, and self-adaptation. To address these challenges, disadvantaged students adopt four types of action strategies: goal-oriented, observational imitation, pluralistic internalization, and value negotiation. These strategies have dual characteristics in practice: on the one hand, they constitute an “action toolbox” that individuals flexibly draw up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ternal logic and action orientations of different strategies exhibit significant tensions.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adaptation patterns of disadvantaged and privileged students in their post-graduation trajectories, the study uncovers the “black box” of processes between “obtaining a diploma” and “realizing status,” systematically revealing the micro-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disadvantage amplification” and “advantage accumulation” are incrementally shaped in the process of class mobility. To this end,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hould shift their support for socialization from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to “building capacities”; students from disadvantaged backgrounds need to strengthen their agency and enhance their employment adaptability by accumulating social investment and converting capital.

Key words: graduates from elite universities; disadvantaged students; socialization; employment adaptation; narrative research